

● 李建德 著

经济制度演进大纲

JINGJI ZHIDU YANJIN DAGANG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经济制度演进大纲

THE OUTLINE OF EVOLVEMENT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李 建 德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制度演进大纲/李建德著. -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3

ISBN 7-5005-4546-0

I. 经… II. 李… III. 经济制度 - 经济史 - 研究
IV. F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5396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

E-mail: cfeph@drd.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 8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发行处电话: 64033095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财经图书发行中心电话: 88119132 88119130 (传真)

涿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19.75 印张 463 000 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涿州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定价: 40.00 元

ISBN 7-5005-4546-0/F·409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马克思主义 研究纲领的结构

马克思主义 (Maxism) 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马克思主义对时代的深刻理解及由此而产生的正确应对。马克思主义对时代的正确回应，基于理论的实践性和科学性。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源泉。理论在分析与叙述方面的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源泉，使这个理论具有

^① 本章的内容，按传统的分类方法是专门讨论方法论的。这是本书的理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是最重要的一章。不过，历来对方法论缺少兴趣或在这方面的理论准备不足的读者，可以跳开这一章，直接从第2章开始。

巨大的说服力，从而能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南，并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完成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

时代的变化，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不同的回应。在不同的国家，面对不同的国情时，也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不同的回应。但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总有她明确的内在规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必须坚持、不可动摇的部分，什么又是应当随着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变迁必须给予适时调整的部分，这些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没有能明确解决的问题。正确认识与处理这个问题，是正确地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也正是本书的基本前提。

本章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本章分析了科学研究纲领的结构：所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指导研究的规则，而所谓外围保护带则是运用这些规则于现实的具体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的最根本的内核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基本命题。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这个基本的研究规则可以演绎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则。而后，分析了由这个根本研究规则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纲领内核中在当代必须强调的其它研究规则：整体分析与个体分析相结合，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等等。最后，本章讨论了所谓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只能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者说是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这就要在坚持上述一系列研究规则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其外围保护带。这种调整的依据在当前主要是要适应社会实践的发展，适应人类文明的进步和适应经济学这个学科的演化。

1.1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纲领及其核心

以马克思《资本论》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一样，首要的特征就是其实践性和科学性。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他对自己的经济理论作了最成系统的建构。马克思在这部巨著中，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内在的运行机理，通过从抽象到具体的阐述方法，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解剖得条分缕析，并以其强有力的逻辑预期了资本主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这套理论建构，不仅为人们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且曾经激起几乎所有国家中几代人的革命热情，产生了极大的学术与社会影响。

在此后的 100 多年中，生产力、社会生活、科学技术和各部门社会科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不对时代的显著变迁作出必要而且应该是正确的回应。这就使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什么是可以而且应该发展变化的，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个界线划得使必须坚持的范围过宽，往往就使学说趋于僵化，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这个界线划得使必须坚持的部分也成为可否定的，则使学说从根本上丧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使其丧失实践性与科学性，也从根本上使其失去生命力。只有解决好了这个基本问题，才能使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经济学，既不继续陷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窠臼，又不至于落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某些片面性的陷阱。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才是中国经济学真正的现代化之路。

1.1-1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在她诞生之时起，经历过多次“危机”。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学术危机，则是起因于传统社会主义（Traditional socialism）的部分失效。我们把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模式，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处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包围之中，不仅亟需政治上的独立，也亟待经济上的独立。在经济上首先建立起民族的重工业部门，既是国防的需要，也是经济生存的需要。在这个特定条件下，能够“集中起来办大事”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就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传统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的被选择，固然有意识形态上的渊源，更重要的还在于实践中的需要。一旦这一制度建立了起来，并且发挥了作用，经济制度的完善过程及其发展变化都不能不受这一初始形态的影响。

传统社会主义不仅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且这个经济制度为完成那个历史条件下的经济任务与政治使命的绩效是显著的。从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8年的30年中，前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了19.3倍，年增长率高达10.3%；而且，不论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还是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前苏联经济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的表现都是最出色的^①。更何况，在这个历史时期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曾发生过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而前苏联则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辉煌的胜利背后，无疑得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

^①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综合统计研究室编：《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1800—1982）》，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第24，第166，第171，第173页。

支撑。这些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新中国在成立后选择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不论从意识形态的渊源，还是从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来看，都曾经是正确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①。

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成效，斯大林显然是十分自豪的。在1950年初，他意识到可以也应该对他所创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了。在他的关心和直接指导下，由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终于出版。该书上册为包括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内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下册则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他在这部教科书的写作过程中，所发表的主要意见以及理论阐述，也集为小册子发表（斯大林，1952）。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本小册子以及这部教科书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经典。

本书将指出，任何经济制度都有其一定的适应性。计划经济制度也不能例外。任何在紧急状态下的动员经济，都是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在一定范围内这种经济体制的有效性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把在一定条件下有效的制度，作为一般有效的制度，就大错特错了。30年代，在理论界发生了一场关于计划经济的大讨论。现在想来，这场争论的学术信息没有能充分影响到当时的政治决策。甚至40—50年代初，申农的信息论和维纳的控制论的发表也仍然没有能影响到当时的决策。这是令人遗憾的事。随着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由此而来的消费层次的上升，生产信息和消费信息的数量迅速上升，复杂程度日益提高。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的优越性由此而逐步下降，而其局限性却日益显露。传统社会主义也未能避免经济制度在成熟

① 关于传统社会主义，本书的第5章还将专题讨论与分析，这里就从简了。

之后的锁定 (Lock-in): 经济体制僵化, 经济增长逐渐放慢甚至出现停滞, 人民生活水平上升缓慢直至相对下降。社会主义能够给人民带来民主和富裕的信念与传统社会主义后期的现实出现了矛盾。这对矛盾的深化, 终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出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放弃。在东欧及前苏联, 人民以选举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放弃的意愿, 在中国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航向。与此同时, 人们对那个与传统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念产生了深刻的危机。

这一信仰危机很有代表性的一例, 是樊纲在经济学中对“斯大林范式”的批评。他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明确地以理论分析的方式提出了“我们的确到了批判和抛弃‘苏联范式’的时候了”(樊纲, 1995)。斯大林不仅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形成时期的国家领导人、理论上的主要阐述者, 而且, 也是把这一模式僵化为社会主义唯一“正确”形态的权威。在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今天, 对斯大林的相关理论与思想进行再思考、再认识是十分必要的。何况, 敢于在这个时点提出这样的命题也需要有相当的理论勇气。

樊纲的主张并不仅仅是要求在走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同时, 相应地需要对反映这一模式的理论进行必要的批判。虽然, 他在文中认为前“苏联范式”并不等同于“马克思范式”, 但问题在于, 他仍然明确认为, 在认识到了前苏联范式与现实经济的冲突时, 我们既不应该“回到马克思”那里, 也不应该仅仅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 而是要我们“运用一套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樊纲, 1995)。因此, 他所主张的就不仅仅是批判前“苏联范式”, 而且还需要我们认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范式”了。

1.1-2 “范式”和“研究纲领”

有没有一个“斯大林范式”？什么是“马克思范式”？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讨论一下“范式”（Paradigm）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科学哲学研究者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Kuhn, 1962）。他对科学发展过程的研究，是从批评波珀的“可证伪性”入手的。简单地说，波珀认为，科学的进步不可能是对理论的证实，而只能是在对不正确理论的证伪（Falsification）基础之上（Popper, 1959）。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科学命题应是全称命题^①（Universal），例如，通常所说的“乌鸦是黑的”，实际上是“凡是乌鸦都是黑的”这样一个全称命题。为了证实这个命题，不仅要把所有的乌鸦抓来，而且，还要把所有曾经存在过的乌鸦，甚至还应该把将来可能有的乌鸦都抓来，才有可能。显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抓到哪怕是一个白色的乌鸦，那么，“凡是乌鸦都是黑的”这个命题就被证伪了。波珀认为，对于科学发展重要的不是致力于收集事实，而是要提出大胆的假说，这一假说要能够经得住实验和批判的检验。如果假说或理论被实验证明为假，就应坚决抛弃，并代之以更经得住检验的假说或理论。他认为，科学通过这一无限的发展而接近真理。他的这一理论，他的成果，是科学认识论的一个重大进步，使原来在自然科学界占据很大影响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归纳主义失去了市场。

库恩不同意波珀关于科学是通过无限发展而接近真理的观点，并因此而提出了科学革命以及科学革命结构的学说。他认

^① 正因为波珀认为科学命题或自然规律都应是全称命题，而他又判定对人类的进化过程的描述不是规律，而只能是一个个单称的历史命题（波珀，1957，中文版，第85—86页），所以，他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决反对者。我将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恰恰是全称的。

为，当科学中出现了一系列“反常”，引起了“危机”的时候，就出现“范式”的更换；因此，科学的发展主要是以一个新范式替换一个旧范式的革命过程。所谓范式，他是指一个科学共同体所有成员所共有的，并能使他们在释疑当中、能使他们在问题的选择中、在解决问题的进化过程中观点趋于一致的那种力量（Kuhn, 1970，中文版，364页），是“科学共同体的信念”或“信仰”的简要表述。

库恩的论著无疑开创了对科学革命的研究。在自然科学中，存在着多次革命已经是无可争议的史实。不过，库恩本人对“范式”的使用是多义的，而且最后还十分遗憾地竟放弃了这个概念。科学史研究者科恩对科学革命的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比如，科恩认为，科学中发生革命的标准不仅要有一个逻辑的标准，执行这一标准需要考察“科学革命”概念的历史演变，同时还必须有一个历史的标准，执行这一标准要求判定每一次科学革命要有足够的历史证据。因此，所要求的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而不仅仅如库恩那样，只强调科学革命的逻辑，而把科学革命的历史仅诉诸于科学共同体的承认或信仰（Cohen, 1985）。当库恩仅仅把科学革命看成是“范式”变换，或者是科学共同体中信仰的转变，这就把科学发展的问題看成是一个心理过程，而且是非理性的心理过程，似乎是一种宗教的皈依。

科恩对科学革命研究的发展，应当得到我们的重视。我们由此可以形成的共识是，当科学发展中出现了革命之后，前后两种理论可以被看成是两个不同的范式。多数学者认为，范式的定义是：一种共同具有的方法、标准、解释的模式，理论或共同具有的知识（Cohen, 1985，中文版，第26页）。

如果说，在社会科学中曾经发生过革命的话，那么，最重要、最清晰可见和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由马克思所发动的以历

史唯物论反对历史唯心论为最主要特征的革命。这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根本方法论上的革命。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应该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具有的共识。根据“范式”这个词的语境，除非斯大林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发动了一场“科学革命”，才能有一个所谓的“斯大林范式”。斯大林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什么革命。任何人，包括樊纲在内，都没有证明过这一点。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与斯大林的经济思想之间，说不上是两种范式。在马克思经济思想与斯大林经济思想是同一个范式内存在着不同思想与意识这一判定下，否定“斯大林范式”的实质，就是否定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认同。在泼掉污水的时候，樊纲干脆连婴儿也不要了。

我们发现，不论是为了区分马克思的基本方法与斯大林观点之间的区别，还是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之间的比较，“范式”并不是一个适用的概念。如果说，在考察科学发展的长过程时，需要强调发生科学革命之前后的科学理论之间的本质不同，“范式”这个概念是有相当分析意义的，能指证科学研究发展或革命过程中的结构。但是，“范式”这个概念却不能说明一种学说自身的结构，不适宜对科学发展与科学革命作更为精细的研究。而另一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学说内部的基本结构进行分析的理论架构：科学研究纲领（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拉卡托斯认为，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hard core）上有明显的区别。纲领由一些方法论规则构成：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拉卡托斯称之为反面启发法；另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拉卡托斯称之为正面启发法。一方面，纲领的反面启发法禁止我们将否定的推论对准这一

“硬核”，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独创性来阐明、甚至发明“辅助假说”。这些辅助假说围绕该硬核而形成了一个保护带(Protective belt)，而我们必须把否定的推论转向这些辅助假说。拉卡托斯认为，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相反，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的事实才构造出来的(Lakatos, 1978, 中文版, 第67, 第66和第7页)。

不过，不论是拉卡托斯还是其后人，都没有对研究纲领的自身结构作出进一步的和明确的分析，因此，至今在讨论科学革命的问题时，为了表达科学革命这个基本范畴，学者们或是使用库恩的“范式”，或是使用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甚或是使用劳丹的“研究传统”(Laudan, 1977)。连最基本的范畴都没有能取得比较广泛的共识，明显地影响着科学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我把科学研究纲领的内核定义为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而规则也就是制度。因此，内核可以看成是科学中的制度。在过去，研究规则往往被称为研究方法，或称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更愿意称其为研究规则。而规则要成为规则，就必须是一种共同的认识，由此，把它理解为是一种信念也是可以的。“范式”的区别，就在于研究规则的不同。因此，科学革命是研究纲领中发生的变化，而外围保护带中辅助假说的适应性调整，则是科学在传统范围内的进步。因此，“研究纲领”这个概念是比“范式”更为精细的概念。所谓“传统”，在制度经济学的语汇中也意指规则或信念。因此，劳丹的“研究传统”也只相当于研究纲领的内核，而不能涵盖“研究纲领”的整个蕴意。

所谓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或称辅助假说。如果在一个学科中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并不存在方法论方面的分歧，那么这个学科中的差别只是同一个研究纲领中就如何确立保护带所发生的分歧。一般来说，由于在规则上的认同，这种分歧就比较容易消解。如果在一个学科中存在不止一个研究纲领，那么，不同的研究纲领在其主张的研究规则之间，一定存在某种或某些差异，至少会在某个或某些具体规则之间存在着差异或矛盾。由于研究纲领这个语汇最能够区分科学中的方法与具体假说这两个部分，因此，使用它比“范式”或“研究传统”这两个语汇更宜于反映科学发展的比较。

从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规则这个意义上，不过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也是制度。盛洪说“从制度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科学是一种‘制度’。通过这种制度人们实现了人脑之间的联合，如同通过市场，人们实现了人手之间的分工一样”（盛洪，1996，第162页）。正是他的这个思想，推动了我对研究纲领的内核作出如上的定义。不过，第一，市场不仅实现了人手之间的合作，而且，也实现了人脑之间的合作。第二，我是从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规则的意义上肯定科学与制度之间内在的一致性。也因此，我不能认为一个研究纲领中保护带所阐述的具体内容也是制度。如果那样就会把制度泛化。而且，盛洪在他的这篇文章中还把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如：“科学自由的规则”、“公平竞争的规则”（盛洪，1996，第163页）。等同于科学本身了。

既然研究纲领的内核是由一组规则的集合，那么，在内核的各个规则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结构。至少，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纲领中是这样的。

1.1-3 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的核心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的内核中，有一个根本研究方法，或称研究中的根本规则，还可以称之为研究规则的规则。这就是由他本人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Social existence determines social consciousness）这一命题。通俗地说，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社会存在必定是第一性的。这个规则不仅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本质区别，而且，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之间的本质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是两个不同的“范式”。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并不是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简单延伸。马克思是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进行了一场“革命”，而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场革命，不仅仅是一些观点上也即具体的假说方面的变革，也不仅仅是一些重要结论上的不同，而首先是研究规则上的根本革命。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基本规则，而且，通过把这个命题演绎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Productive forces determin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也就成为他经济学说的基本规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力必定是第一性的。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马克思本人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作了最严谨的表述，并称之为是“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
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1859，中文版，第82—83页）。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一切可能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虽然也积极地或消极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但是对于个别人、对某一个社会集团来说，社会意识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甚至在“理想成为现实”时，社会意识本身已经转变成社会存在。但是，并不是任何社会意识都能对社会存在发挥积极作用，甚至转换为社会存在的。只有正确反映了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只有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那些社会意识才能如此。因此，归根到底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而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这一个根本的研究规

则，就是不能接受以任何否定式的推论对准这样一个命题。“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恩格斯，1859，中文版，第117—118页）。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力通过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虽然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内核，但也仍然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命题的延伸或演绎，其有效性也会存在某个界限（本书将会给予具体的讨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这个命题是，但毕竟还不完全是一个全称的命题。阶级斗争的学说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中最本质的东西，而且还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创造。它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中的保护带，虽然在整个保护带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假说。因此，它的适用范围及其有效性需要不断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如果需要则可以有所调整。劳动价值学说也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创造，而且，从逻辑上说，这个命题与阶级斗争学说相比较，离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甚至离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些命题更远，它当然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外围保护带。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内核（注意：决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缘故），保护带中的任何命题，并不是一定不可以调整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首先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在客观上有着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人类社会演进客观地趋向于共产主义社会，因此而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如果，人类社会在演进过程中，没有迹象能够客观地显现出共产主义社会的趋向，那么，我们可以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我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诸如此类，等等。总